

# 玉爵屠蘇百禮洽

吳曉筠

## 爵的歷史與以爵飲酒的淵源

「玉爵屠蘇百禮洽，金猊瑞靄萬祥濃。撫時幸值承平會，泰九三思凜益恭。」（《元正太和殿賜宴紀事二律》，《清高宗御製詩集》第五集，卷五十一）這是庚戌年（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的新春，乾隆皇帝於太和殿賜宴群臣時所吟詠的詩句。在慶賀新年的時節，以上古時代青銅爵發展而來的玉爵杯飲用屠蘇酒，似乎反映了對古禮的傳承。然而，上古時代的爵，卻不是作為飲酒用的杯子。本文欲通過爵的發展歷史，說明爵的重要性從何而來，以及伴隨而來的觀念繼承與轉變。

### 上古時期的爵與爵位觀

爵的型制十分特別。深筒狀的腹部以供裝盛，口緣兩端分別為一流口及一尖尾，緣上更有兩個立柱，腹底為三個三角椎狀足。如此奇特的造型看似是脫胎於新石器時代的帶流及深腹三足陶器，如鬯及罍等器類。但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指出了伊朗沙赫達德（Shahdad）遺址所見紅銅「爵形器」與爵的相似性，則為爵的起源帶來另一種可

能。（註一）

新石器時代未見陶製的爵，但這種器物卻是中原地區鑄造青銅器初始時期的代表，是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青銅酒器。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爵發現於傳說中夏王朝所在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時間點約在西元前兩千年。此時的銅爵器壁纖薄，表面光素無紋，帶有腰身的器身，上緣一端為窄長流，一端為尖尾，平底器腹下為三支尖細的足。輕盈的器



清 乾隆 碧玉爵托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商晚期 父乙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形。原本短小的雙柱增高了許多，並且以高聳的菌首造型增強其在結構上的重要性。(圖三)

與鼎、鬲、甗等三足銅器一樣，青銅爵的三足是爲了架高器身以方便加熱而設計的。容庚在《殷周青銅器通論》中，便已據其所藏〈商晚期父乙爵〉(現藏本院)器腹下方的煙燻痕跡判斷，認爲銅爵是一種溫酒器而非飲酒器。(圖四)在二里頭及商前期遺址出土的青銅爵上，也可看見類似的煙痕痕跡。學界對爵口沿上雙柱的功能有許多說法，認爲是方便爵受熱後舉起，或認爲是放置匕的裝置，但現在仍莫衷一是。(註二)



圖一 二里頭 銅爵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身配以伸展的流口，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平衡狀態，予人簡約的流線感。(圖一)從世界史的發展來看，鑄銅是上古時代高科技的展現，因而普遍有「青銅時代」這樣的稱呼。銅料取得不易，是非常珍貴的材質，因此，古代文明用銅初始階段，多將之用來生產具有戰略意義的兵器，或小型的裝飾品。但中原地區用銅的開始便是鑄造兵器及結構複雜如爵的酒器，對飲酒傳統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商代前期的銅爵結構雖與二里頭銅爵一致，但縮短了流和尾。搭配筒形器身鼓出的下腹及獸面紋，表現了較爲穩定的質感。(圖二)商代晚期(即殷墟時期)的銅爵造型有顯著的改變。銅爵的器身變得高大厚重，器腹底部改爲圓弧

商王大墓被盜嚴重，現在已無法得知商王使用多少觚、爵隨葬，但更多在安陽發現的貴族墓葬顯示，晚商貴族以擁有特定數量的觚爵組來標示身分。婦好自己除擁有巨型銅爵外，更擁有一套十件銅爵及兩套分別爲六件及九件的銅爵組。在稍晚於婦好墓的安陽花園莊五五號墓中，埋葬的是一位具有顯赫戰功的高級貴族——亞長。九件觚及九件爵，標誌了他的社會身分。小屯十八號墓中則出土了五件觚及五件爵。一般的貴族墓葬，如安陽大司空村五三九號墓、郭家莊東南六六三號墓，均是以二件觚、二件爵隨葬。最小的貴族

與溫酒器爵相互搭配的飲酒器是觚或斝。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發現的一座商晚期墓葬內，隨葬了觚、爵及盛酒器罍及卣。兩件盛酒器內均發現了板栗樹的葉子，表示商貴族可能以板栗葉泡酒。(註三)這樣的酒器組合反映了商人的飲酒習慣是先將酒裝盛在尊、罍、甗、卣等盛酒器中，以勺子舀出放入爵內溫熱後，再倒入觚或斝中飲用。如此獨特的使用方式，顯現商人對喝酒的講究。

觚與爵的組合關係似乎在胡博所指出的伊朗沙赫達德遺址便已存在。但在中原地區，一直到商早期偏晚才固定下來。殷墟時期觚爵的搭配益加固定。一方面，商人以豐富的酒器裝盛酒水祭祀神靈祖先，另一方面，致贈其他貴族特定數量的觚爵組，也成爲進行社交活動的方式。商王武丁配偶婦好的墓葬，是目前所知最完整、出土文物數量最多的高級貴族墓葬。其中，共出土了四十件青銅爵及五十三件青銅觚，數量爲各種酒器之冠。依據器物上的銘文判斷，大多數的成套觚爵組是來自其他高級貴族。

商王大墓被盜嚴重，現在已無法得知商王使用多少觚、爵隨葬，但更多在安陽發現的貴族墓葬顯示，晚商貴族以擁有特定數量的觚爵組來標示身分。婦好自己除擁有巨型銅爵外，更擁有一套十件銅爵及兩套分別爲六件及九件的銅爵組。在稍晚於婦好墓的安陽花園莊五五號墓中，埋葬的是一位具有顯赫戰功的高級貴族——亞長。九件觚及九件爵，標誌了他的社會身分。小屯十八號墓中則出土了五件觚及五件爵。一般的貴族墓葬，如安陽大司空村五三九號墓、郭家莊東南六六三號墓，均是以二件觚、二件爵隨葬。最小的貴族



圖三 商晚期 子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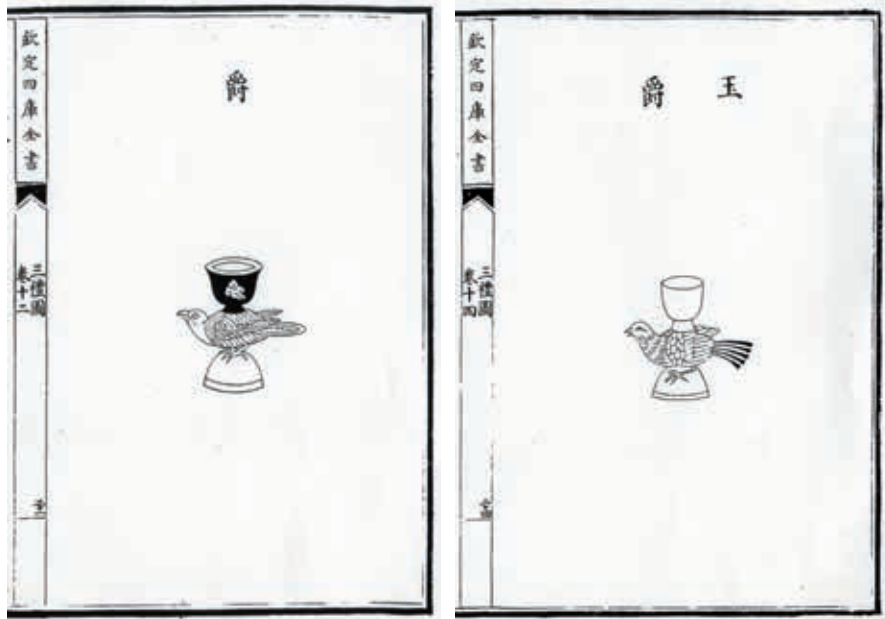
圖二 商早期 獸面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北宋 徽宗 大晟一姑洗中聲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釋為雀鳥的鳴叫聲。因此，當北宋著名經學家聶崇義著《三禮圖》以圖繪說明古代禮器時，便承襲至少自唐代以來的觀點，（註五）將爵描繪成了雀鳥背負著杯子、下有一圈足的樣子。（圖五）此外，書中更列「玉爵」一項，引古書所言認為是宗廟中以酒祭享先王或祖先的重要禮器。

宋代士大夫所推動的新儒學，重視上古禮制的恢復與經學的復興，聖賢時代的器用制度當然也是重要的目標。順勢而興的便是對三代文物的重視。北宋呂大臨所編古器物圖譜《考古圖》便收有商周銅爵八件，並以爵名之。呂大臨解釋這種「主人所舉獻賓之爵」謂：「今禮圖所載爵皆于雀背負琖，經傳所不見，固疑不然。今觀是器，前若喙，後若尾，



圖五 北宋 聶崇義 《三禮圖》〈爵〉與〈玉爵〉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墓葬，如殷墟西區二六一號墓、小屯十七號墓，則以一件觚、一件爵表現身分。除了銅觚銅爵，貴族也多會搭配一套陶質觚爵隨葬。在這一時期，以成套觚爵數量多寡表達的序列觀念，成為表現貴族社會階層的重要指標。（註四）也就是在這樣的發展中，奠定了日後以「爵」作為官位指稱的來

源。

西周時期，貴族們雖時刻提醒著自己不可以如商人一般放縱飲酒，但為數眾多的酒器顯示飲酒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周人鮮少以觚為酒杯，而改以觶為主，與爵互相搭配使用。在著名的陝西扶風莊白窖藏中，埋藏著微氏家族四代族人的青銅禮器，爵在其中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第一代「折」的器物為四件具有商遺風的青銅酒器。第二代「豐」擁有包含三件爵在內的五件酒器，以西周中期流行的樣式為主。第三代「墻」的祭器除著名的《史牆盤》外，另有兩件銅爵。在西周晚期第四代「癸」的四十餘件禮器中，雖以大量食器、樂器為主，仍包含了三件銅爵。

周王室東遷，西周結束後，爵也不再為貴族所用了。然而商代所確立的爵與階級身分的關連性，卻一直持續著。戰國時期秦國商鞅建立了封賞軍功的二十等爵制，並成為漢代政治制度的參考。「爵」字更成為了尊貴身分的代名詞。

### 古代典範的重塑與以爵飲酒觀的確立

商代甲骨文以象形方式表現此類器物，作「𠃉」、「𠃊」等形。但以「爵」名器，是始於北宋。雖然東周以後便不再使用爵，但如《儀禮》等描述上古禮制的禮書仍有許多關於以爵獻酒的記載，成為後世認識此類禮器的依歸。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鬯部〉謂：「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顯然，受到禮書記載的影響，認為爵是飲酒器的觀念在漢代時已固定，而「節節足足」更被後人解

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于雀，其名又曰舉，其量有容升者，則可謂之爵無疑。」正式將商周銅爵與文獻中的爵劃上等號。

宋徽宗勅撰《重修宣和博古圖》中，對爵的定義有更進一步的闡釋。「凡彝器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器是也，蓋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至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說明爵本身體積雖小，卻為禮器中之至關鍵者。也因為爵如此重要，故而認為這是周人考夏商兩代制度的創發，是周公制禮作樂「禮文大成」時代的象徵。

爵與周人的關連性，在南宋時期有更進一步的闡釋。院藏南宋紹熙年間刻本《纂圖互註毛詩》〈祭器之圖〉中除詳細描繪爵的外型，並加以說明，謂：「一升曰爵，上有兩柱取飲不盡之義。三足如戈形，戒其過而傷也。」將爵的型制直接與周人戒酒的傳統觀念連繫在一起。

宋代朝廷對夏商周三代古器物的重視，更重要的目的是欲通過三代古器物的研究，來創造仿古的「今器」，以弘揚古代價值在當代的新意義。（註六）徽宗大觀二年（一一〇八），在兵部尚書兼侍郎充議禮局評議官薛昂的倡議下，朝廷開始積極訪求古器，並進行皇家復古禮器的製作。大量的仿古銅器被用於廟堂之上，院藏徽宗朝所鑄《政和鼎》、《大晟一姑洗中聲鐘》均是重要的例証。（圖六）在北宋徽宗「隆禮制樂」的目標下，仿古銅禮器成為祭器的主要形



圖九 元 張雨題倪瓚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傳) 宋 李公麟 歸去來辭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廷，喜歡將古器融入生活。院藏元〈張雨題倪瓚像〉中，便可見得到以爵和其他文玩作為居家陳設。(圖九)古式器物的流行範圍更加廣大，除了如《大明會典》所示，朝廷以仿古器或古器名布列祭器，許多繪畫作品也可見到對古式爵的描述。院藏〈傳〉宋李公麟〈歸去來辭卷〉便有居家飲酒的描繪。酒水裝盛於放置中間的古式大酒壺，每人各配以一只爵

### 爵杯與屠蘇介壽

宋代以來對古禮及古器的追求，使包含爵在內的古式

杯和裝盛果物的高足盤。(圖十)爵杯搭配細嘴鸞把酒注的場景，則可見於院藏明唐寅〈韓熙載夜宴圖〉中。(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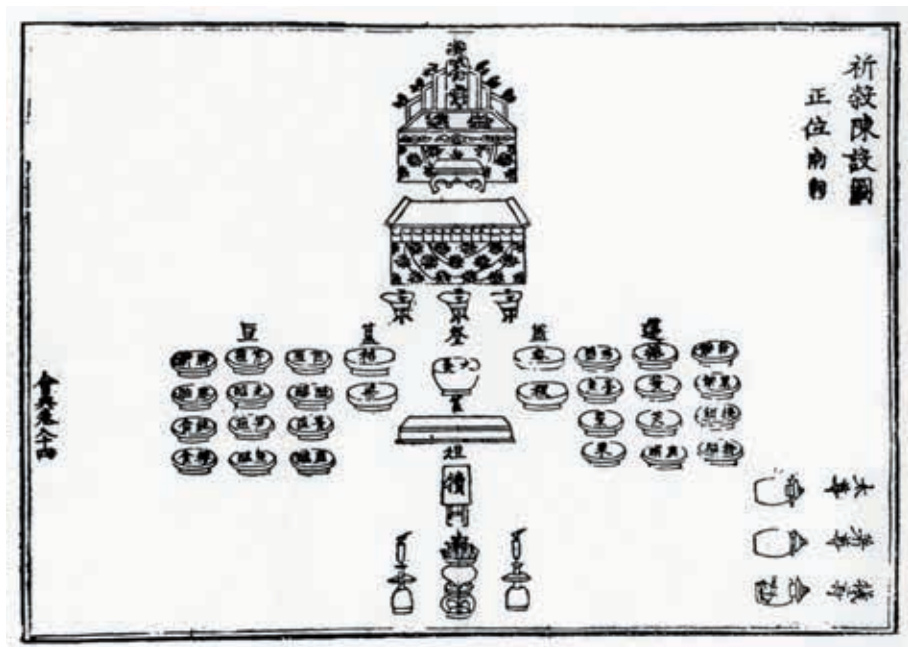
式。南宋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朝廷添置郊廟祭器時，高宗特別要求「將來郊廟玉器，當先製。：如玉卮玉爵之類，今皆未備，豈可不先制也。」(註七)飲酒禮器成為廟堂玉製禮器的首要器類。

宋代朝廷所確立的仿古廟堂禮器，多為後世所繼承。爵作為飲酒禮器的角色，更有深遠的影響。明代律典《大明會典》所記載的各種儀式中，舉爵獻酒是儀式中的重要動作。(圖七)在祭禮禮器陳設上，進獻酒水的爵排列在最前列，後為豆、簋、簠、籩等以古器物為名的盛食器。盛酒的酒尊放置在最外面。祭器雖均以古器為名，但實際上僅有爵的器形具有上古器物的形式。(圖八)

圖八 《大明會典》卷之八四 郊祀四 祈穀 祈穀陳設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冊 漢孝明皇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大明會典》卷之八四 郊祀四 祈穀 祈穀陳設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 乾隆 碧玉爵托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清 乾隆 鍍金番蓮爵托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器物極受重視。但將爵與長壽意象相結合，可能始自明代。院藏〈明永樂青花波濤龍紋帶托爵盤〉（圖十二），提供了可能的線索。瓷爵圓底、三外撇細足、橢圓流口及尾，以及立於口沿深凹處的兩細柱，均為典型明代爵的樣式。器身上繪雙雲龍紋，下有山石海水紋。爵杯配有托盤，盤心有一突

起，上有三個凹洞以納爵足，略為凹下的頂部用以承托爵杯圓底。突起的納爵墩座繪仙山紋樣，盤面上則為雙龍海水紋。目前所知最早的仿銅瓷爵出土於安徽歙縣的一座元代窖藏中，但為瓷爵配置山形歇爵盤，則為明初的創新設計。爵杯及托盤面上仙山與海水所構成的「壽山福海」意象，為爵



圖十一 明 唐寅 畫韓熙載夜宴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明 萬曆 金托玉爵及金托金爵 引自《定陵（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圖十二 明 永樂 青花波濤龍紋帶托爵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紫禁城寧壽花園 群嬰獻壽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辟雍「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以金爵向長者獻酒，進行養老禮的場景。(圖十六)在紫禁城為乾隆退隱生活準備的寧壽花園中，一幅大型貼落〈群嬰獻壽圖〉描繪乾隆端坐在后妃子孫中央，一位皇孫捧著爵杯向乾隆敬酒。多子多孫多福氣，以及以酒寓意長長久久的想法，在這幅乾隆皇帝為自己晚年所準備的畫像中，明確地表達出來。(圖十七)

在舉爵上壽的觀念下，爵當然成爲皇帝每年元旦飲用延



圖十六 清 陳士倌 聖帝明王善端錄(漢) 冊 漢明帝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增添了新的形象意義。(註八)

爵杯及托盤的組合十分符合明清宮廷對長壽吉祥及華麗瑞象的追求。除院藏多套明嘉靖款爵盤組外，最爲精美的爵盤組出土於萬曆皇帝的定陵中。兩種爵盤組展現明代御用器的極致形式。第一種金托玉爵，以潤白的和闐玉琢製成爵的形狀，器身琢出龍紋，流口及尾部各有一字，合爲「萬壽」，器身一側帶有螭虎造型的鑿。金托盤中央納爵墩座爲山石奇峰造型，盤面上浮雕雙龍戲珠紋，全器嵌以紅藍寶石點綴。另一種金托金爵，以黃金打製而成，並以寶石點綴。托盤中心突起納爵墩座，一改山石設計爲三個花瓶，瓶內插著嵌寶花卉，富麗異常。(圖十三)

延續明代宮廷作法，清乾隆皇帝也以多樣化的材質、工藝，如瓷、金、玉、琺瑯等，製作爵盤組。〈清乾隆碧玉爵托組〉秉持明代以來的傳統，將托盤承爵墩座製成山石海水狀，盤面則爲整齊的仿古夔鳳紋。(圖十四)所配爵杯以仿古意象爲主，裝飾著夔鳳、獸面、回紋等紋飾。〈清乾隆鍍金番蓮爵托組〉爵身及托盤均飾浮雕嵌寶花葉紋，表現出與明定陵所見金托金爵之間的承繼關係。爵杯上嵌寶番蓮花卉紋樣、口沿處的仿古回紋及三尖榫足，則與〈清乾隆金甌永固杯〉相互呼應。(圖十五)〈清乾隆金屬胎掐絲畫琺瑯爵托組〉上除可見細緻的掐絲琺瑯工藝，開光處更以畫琺瑯表現母子、山水及花卉等主題，展現清宮獨特的工藝的創造。

爵與長壽的關連性，更明確表現在清代的宮廷繪畫中。清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漢) 冊漢明帝一〉繪漢明帝於

年益壽屠蘇酒的酒器選擇。而宋代以來古式玉飲器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又使得玉爵杯備受重視，故而有了「玉爵屠蘇百禮洽」的吟詠。就這樣，上古時代用來溫酒、表現社會身分的爵，到了乾隆皇帝時，成爲行禮如儀、具有長壽意象的飲酒器。註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 "Qij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vol. 20 (1995): 17-67.
2. 朱鳳瀚, 《中國青銅器綜論(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九, 頁一五七。張光裕, 《從新見材料談〈儀禮〉飲酒禮中之禮柶及所用酒器問題》, 《文物》二〇一二年二期, 頁六九—七〇。
3. 唐際根, 《殷墟: 一個王朝的背影》, 北京: 科學出版社, 二〇〇九, 頁八五。
4. 陳芳妹, 〈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 《故宮學術季刊》三卷二期, 頁二一—八二。
5. 唐恭陵哀皇后陵墓出土一件與《三禮圖》所繪爵杯相近的杯子。相關討論見謝明良, 〈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 《中國陶瓷史論集》, 臺北: 允晨文化, 二〇〇七年, 頁一七一—一八九。
6. 研究詳見陳芳妹, 〈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 《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十期, 二〇〇一年, 頁三七—一六〇; 〈金學、石刻與法帖傳統的交會——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拓石本殘葉的文化史意義》, 《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三期, 二〇〇八年, 頁六七—一四六。
7. 熊克, 《中興小記》, 百部叢書集成(臺北: 藝文印書館, 一九六五), 卷二〇, 頁八b。引自許雅惠, 〈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 《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三期, 二〇一一年, 頁七。
8. 〈明永樂青花波濤龍紋帶托爵杯〉相關討論見廖寶秀, 〈明永樂青花波濤龍紋帶托爵杯〉, 《故宮文物月刊》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頁一一四—一一五。